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鹏,杜若桢.从乡土场域到公共景观: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空间叙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6):47-53.

从乡土场域到公共景观: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空间叙事

李鹏 杜若桢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空间叙事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下的动态适应与文化转译,传统乡土语境下的表演空间以安塞县地理环境、乡土社会结构为依托,衍生成为具有祈雨祭天信仰的神圣空间聚合,并由个人和社群共同建构起乡土场域的空间叙事内涵。从乡土场域到公共景观,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实践使得表演文本的文化意义发生重构,一方面是公共审美空间特性使其趋向公共审美范式;另一方面是在与公共文化场域融合中逐渐成为社群文化的建设载体,被塑造为带有权力互动的国家文化符号。在再语境化进程中,空间泛化导致安塞腰鼓表演符号的部分祭祀文化内涵消解,却也推动其从地域文化载体跃迁为大众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符号,实现了从地方意义到国家意义、民族意义的生产。

关键词:传统乡土语境;表演文本;国家文化符号;大众文化场域

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6-0047-07

安塞腰鼓表演最初衍生于黄土高原独特的地貌环境,并逐渐与陕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祭祀信仰、节庆仪式相联结,其磅礴的鼓点节奏和刚劲的动作程式由古代军事战争所建构,承载了地方集体记忆与文化精神。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安塞腰鼓表演文本的所指意义不断增加,已然成为公共景观空间中可传递的文化符号。过去,安塞腰鼓为民俗祭祀仪式而舞;如今,它更多地为文化传播与社会认同而演。这一动态化的语境文化意义变迁,彰显着民俗表演再语境化的深层逻辑。

关于安塞腰鼓表演的研究,学界已在多领域展开探讨。部分学者结合非遗民俗表演进校园的政策^[1],从体育课程的角度切入,分析其在学校教育中

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以及对美育的培养等问题;有的学者重视安塞腰鼓表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2],尤其聚焦它的数字化保护以及活态传承;也有学者深入挖掘安塞腰鼓表演的审美文化价值^[3]、社会特征与功能价值^[4],剖析其作为陕北文化符号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涵。同时,还有学者从文化生态视角^[5]出发,研究安塞腰鼓表演在不同社会文化变迁下的具体演变^[6]。

本文中的“再语境化”,是理查德·鲍曼对传统表演理论的修正与拓展,其核心在于突破此前理论偏重文本形式或舞台呈现的局限,将语境确立为表演意义生成的核心维度,进而成为表演理论中联袂表演行为与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框架。随着民俗

收稿日期:2025-04-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中国少数民族汉文文献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词研究”(23JDT CZ024)

第一作者简介:李鹏(1986-),男,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多民族神话比较研究。

通信作者:杜若桢(2002-),女,河北邢台人,主要从事民间文艺学研究,E-mail:1320580182@qq.com。

学、人类学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思,理查德·鲍曼表演理论所主张的语境化实践与再语境化概念,逐渐成为国内研究传统文化动态传承的核心分析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剖析了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空间叙事的动态文化意义变迁,以探讨传统语境与再语境化中表演文本的演变以及其中蕴含的权力互动,以期彰显民俗表演再语境化进程中的空间泛化危机与国家意义、民族意义生产。

一、安塞腰鼓表演传统语境下乡土场域的空间叙事

安塞腰鼓表演传统语境下的乡土场域,是安塞县自然地理环境、乡土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的空间集合。它是历史社会动态建构的空间叙事,以黄土沟壑为地理依托,形成节日仪式联结的社会纽带,实体的乡土社会空间借助信仰衍生出祈雨祭天空间,从个体到社群,再到广阔的神圣象征空间,共同构成了乡土场域传统语境下的空间叙事内涵。

(一)安塞腰鼓表演传统语境下的乡土地理空间形塑

传统语境下的乡土地理空间塑造着安塞腰鼓的表演形态与动作程式。黄土沟壑的地理特征天然形成了具有地域风格的村落分布与农耕文明,衍生出安塞腰鼓表演的特定形态与动作程式;而历史上身居军事边陲的要塞位置使得安塞腰鼓表演顺承了传统军队作战时的铮铮士气。由此,传统语境下的地理空间不仅是安塞腰鼓表演时的场域背景,更是其作为表演赖以生存的土壤。

安塞县地处西北内陆的黄土高原腹地,境内沟壑纵横、川道狭长、梁峁遍布,特有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使得各个村落呈散状分布,有的山梁或深沟中只住了几户人家^[7]。正是这种地形地貌空间造就的村落分布,催生了安塞腰鼓带有地域色彩的表演形式,分散的村庄居民被黄土沟壑隔绝,却又被安塞腰鼓的过街行进表演形式所联结。安塞腰鼓中的路鼓,也叫进行鼓,以动作简单、幅度较小的表演为主^[8],其中多纵身而跳的跨越,这生动再现了过沟坎的高抬腿行为。借助随行随演的形式向沿途村落展示,每一次的表演都被置于更为广阔的黄土高原地理空间中,这种过街走巷、不受空间限制的安塞腰鼓表演成为联结黄土村民的纽带。因此,在传统语境中,安塞腰鼓移动表演空间的展示,本质是对分散村落空间隔阂的突破,依托安塞腰鼓表演的文化纽带,联结物理空间中彼此疏离的黄土村民,其所借助的地

理空间既成为安塞腰鼓表演衍生的溯源,又在表演中得以被突破,催生成为具有密切关联的心理空间。

位于陕北黄土地貌空间中的安塞,形成了独特的散居特点,应运而生的农耕文明也影响着安塞腰鼓表演的动作程式。安塞腰鼓动作中的踢腿、跳跃、跨步、跺脚,皆源于对农耕生产劳动的模仿^[7]。安塞腰鼓表演中的“鲤鱼跳龙门”动作,左脚呈正步半蹲,全身腾空向上跃^{[9](P163)},呈现有起有伏的表演形态,这是对农人跨越黄土沟壑、水渠姿态的直接模拟。“三脚不落地”的动作,则还原了黄土坡地抢收庄稼的忙碌场景,表演者以快速的跳跃、旋转,连贯成一套动作,腾空转体,脚下保持动态不着地^[7],显示了追赶农时的紧迫感。安塞腰鼓表演的鼓点契合农耕的犁地与打谷节奏,这些饱含力量与起伏的动作程式,不仅是身体对黄土沟壑生产环境的适应,以平衡协调与力量跨越显示安塞腰鼓表演的地理空间影响,而且蕴含着陕北民众与土地共生,向自然抗争的生存意志。每一次安塞腰鼓表演鼓点的敲击都是对黄土地的叩问,每一次表演者身体的起伏腾跃都是对靠天吃饭命运的抗争,安塞腰鼓表演成为农耕文化凝聚于身体层面的诉说表达。

安塞县自古以来便是西北要塞、陕北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方镇钥”之称,北与古长城和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相对,南通中原咽喉要道^{[10](P18)}。安塞腰鼓产生于战争,又在历史演变中融入表演^{[11](P23~24)},其表演风格与内核始终受到传统历史语境下军事空间的塑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12](P440)}安塞腰鼓最早也是用于戍边长城战士的预警,后成为骑兵助阵的战鼓,击鼓进军,左右乾坤。时至今日,尽管历史语境下的军事战争空间已然消弭,但是气势磅礴、刚劲激昂的风格内涵仍留存在安塞腰鼓表演中,从安塞腰鼓在固定场域表演的场地鼓中仍能一窥战争残留的影子。如今,安塞腰鼓已成为陕北民众娱乐性的广场舞蹈。今时往日的表演情境重叠,未变的是传统历史语境下战争军事空间对安塞腰鼓表演风格的建构。重现古代军威的队形节奏,成为陕北民众铭记集体文化记忆的方式,更化为乡土社会面对生存压力的集体宣泄;依托刚劲的鼓点节奏和动作步伐,陕北民众显示出敢与自然抗争的勇气与生命力。安塞腰鼓表演在传统语境的军事战争地理空间中沉淀出刚健磅礴的文化基因。

安塞县黄土沟壑、梁峁遍布的地貌环境并非安塞腰鼓表演的后置背景,而是建构其动作程式、风格

内涵的地理空间,成为其文化形态生成的母体。散状分布的村落布局塑造了安塞腰鼓表演特有的路鼓程式,陕北民众在广阔黄土高原空间自发形成了相互联结的隐性心理纽带,催生出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农耕文明的生产实践凝聚起安塞腰鼓表演的张合有势,以身体层面的集体叙事诉说对黄土地的叩问。战争防御的传统军事空间熔铸了安塞腰鼓表演的刚劲沉稳内涵,彰显出古往今来安塞人民的抗争与生命力。

(二)安塞腰鼓表演传统语境下的乡土社会空间建构

安塞腰鼓中的路鼓在走街串巷中对形塑地方社会民众情感认同有着重要作用,其借助身体操演建构起独特的集体记忆文化符号,以此形成带有安塞隐性精神纽带的地方认同与地域社会关系网络^[13]。在地理空间的影响下,安塞腰鼓衍生出的特色身体仪式,不断调节和导控日常生活,并逐渐形成安塞乡土社会的整合。安塞腰鼓表演中最热闹的活动是过年期间的沿门子拜年。正月初八,腰鼓队开始挨家挨户拜年,受拜家庭需准备烟酒糖果或红包以表谢意。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锣鼓唢呐直响哩,屁股底下棍撬哩!”^{[14](P139)}腰鼓队依次走串各家,在主家院中、窑前表演,伞头再依据各家情况演唱几段吉利秧歌,以表贺年之意。腰鼓队进院入户的敲敲打打,可消灾免难。之后,各村秧歌队互访,也叫搭彩门,即秧歌的比艺活动。正月十五,各村腰鼓队云集广场,各路鼓手各显身手,成为一年里安塞腰鼓表演的高潮^{[14](P140)}。

由此可见,安塞腰鼓这一鼓舞形式承载着陕北人民对节日的庆贺,让被地理空间隔绝的黄土百姓生发出对节日身体仪式的神圣记忆。民间鼓舞与特定时空范围内举行的喜庆节日相联结,不断强化着地方民众的内聚力与社会认同^[13],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的自然表达与身体仪式。传统语境下的地理空间孕育了安塞腰鼓,安塞腰鼓又在集体表演中被不断建构,留下历史烙印的同时,也被整合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陕北乡土社会空间。

(三)安塞腰鼓表演传统语境下的乡土仪式空间衍生

安塞县独特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共同衍生出神圣的祈雨祭天仪式空间,以此构成安塞腰鼓乡土场域传统语境下空间叙事的完整内涵。安塞地区依托腰鼓表演祭祀神灵以求风调雨顺,在特定节日(新年与庙会)中赓续原始先民祭天祈地的信仰。安塞

腰鼓表演有驱邪镇妖的意义和浓厚的宗教祭祀属性。

民间信仰往往通过具体的空间意象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进而将具体的地理、社会空间建构为符号化的神圣空间。^[15]陕北民众的神灵信仰与祈雨祭天观念联结着具体的地理空间背景。从北魏到元明清,安塞县修筑了大量庙宇,当地庙会应运而生。每逢庙会,便有腰鼓表演来祭祀神灵以娱神。在《安塞腰鼓》一书中就有对打鼓祈雨祭天的描述:“安塞降雨量多集中于农历七八月,遇春伏多旱时就以腰鼓祈求龙王降雨救万民。”^{[16](P18)}因下雨多伴随电闪雷鸣,安塞腰鼓的鼓声似闷雷,便成为带有巫术仪式性质的祈求降雨鼓舞。巫术仪式本质是一种以对待人的方式来影响灵魂的做法,用控制心理作用的规律操纵着真实事物^{[17](P7~8)}。安塞人民借助腰鼓鼓声的相似,进行祈雨祭天仪式的形塑,向神灵诉说着他们的祝愿,以此建构传统语境下安塞腰鼓表演的祭神神圣空间。

安塞腰鼓表演传统语境下乡土场域的空间叙事,围绕着安塞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祈雨祭神仪式空间展开,黄土沟壑的自然地貌影响着陕北民众散居村落的社会分布,催生了安塞腰鼓中过街行进的路鼓表演形式,使其成为联结乡土社会的隐性精神纽带。从动作程式来看,安塞县传统的军事空间与独特的地理农耕文明,成为安塞腰鼓风格特征的孕育母体。安塞腰鼓表演既受到乡土场域中地理空间的建构,又不断影响着安塞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庙会祭祀与祈雨祭天仪式更是依托安塞腰鼓表演,赋予其巫术性质的宗教属性,从而将实体空间升华为更为广阔的神圣空间,赓续祈天祭地的信仰传统,最终形成传统语境下承载集体记忆的陕北乡土整体空间。

二、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公共景观空间表征

安塞腰鼓表演脱离传统乡土语境后,进入舞台展演的公共景观空间,其程式动作不断演变,所承载的功能意义也发生了更迭。这种调适的本质是公共审美空间的重构,场馆的封闭性、审美主体的改变都要求安塞腰鼓表演转向公共审美范式。同时,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后也成为了公共文化的建设载体,教育、旅游以及社区场域都在不断推动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及其与公共文化场域的融合,使其成为社群公共文化表征。其中同样蕴含着公共景观

空间的权力表征,使得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后被塑造为国家文化符号,表演空间也成为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载体。

(一)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公共审美空间重构

传统语境下的安塞腰鼓表演是深植黄土高原地理空间的活态民俗文本,其表演形态与农耕乡土社会的生产节律、信仰体系深深联结,多生发于谒庙与沿门子的民俗场景中。鼓手们在伞头带领下围绕着庙宇祈雨祭神,或是过年期间挨家挨户拜年祈福,动作程式诉说着消灾免难、护佑平安的信仰传统。因此,传统语境下安塞腰鼓表演是以具体乡土仪式空间为依托,并无固定的舞台;听众既是观赏者,亦是表演者,他们熟悉安塞腰鼓所承载的地方记忆与文化意义,与表演者共享着表演文本的早期经验,共同构成了参与式的地方化表演空间。

理查德·鲍曼认为,可将表演从其传统语境中提取为可传递的客观化文本,并将其作为对象对待^{[18](P4)},而再语境化相当于重新嵌入文本,改变其言外之意和言后效果——它所代表的东西和它的作用^{[18](P6)},进而在跨场景、跨文化传递中完成再语境化。当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进入公共景观空间,向着适用于舞台的形式发展时,其已然从传统乡土信仰仪式转化为舞台审美艺术,从共享早期经验的陕北民众私人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供人们欣赏、消费^[19]。

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后呈现出表演形态的程式化改造,衍生出舞台鼓的表演审美范式。安塞腰鼓表演中的舞台鼓产生于陕甘宁边区时期^[8],表演时空皆有规范性的变迁。表演时间短且队形变化多,封闭场馆的表演空间变化也重构着表演者与观赏者的“演—观”空间关系,以此影响表演者进入公共景观空间后的身份观念。以北京鸟巢安塞腰鼓的舞台化表演为例,当流行音乐与传统民俗相结合,安塞腰鼓表演被剥离出原生的表演语境,将极具代表性的表演文本文化符号作为舞台化建构的核心元素^[20]。在北京鸟巢安塞腰鼓的舞台化表演中,传统表演文本中的鼓点与动作程式得以保留,在较短时间内以高昂的鼓点和变化的队形点燃舞台的激情,成为艺术创作的重构典型。

与之相应的,还有审美主体的改变。理查德·鲍曼在对讲故事者的表演进行研究时,发现表演者不仅会因听众主体的变化而进行表演文本的改编^{[21](P102)},而且会对自我表演身份进行动态调适。

当讲故事者脱离传统的私人讲述环境时,他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公共故事的讲述者,以一种适合维持其作为故事讲述者身份的情境方式来讲述,以此将其作为一个表演者,与听众分隔^{[21](P105)}。当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为舞台化审美的表演文本时,传统语境下表演空间的局内人共享已然转变为局内人与局外人互动参与的舞台化展演^[20],并带有安塞腰鼓舞台观赏者的审美规训。这使得传统语境下安塞腰鼓表演的祈雨祭天信仰传统与宗教意义弱化,进而重构舞台表演空间中“演—观”的关系。安塞腰鼓表演者在舞台化审美规训中,逐渐脱离传统语境下地方乡土听众的参与式表演,形成舞台与观众席的双重互动式隔离,并以此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构与变迁,即从地方民俗传承者、祭祀信仰践行者到公共空间审美下的公众表演者的身份转型。

(二)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公共文化场域融合

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过程,本质是从陕北地方性知识场域向教育、旅游公共文化场域的深入,其依托非遗制度的推动,实现了文化功能的重构,呈现出再语境化表演空间的开阔与所指含义的增大,从而成为社群公共文化的表征。

安塞腰鼓表演已然成为安塞枣园中学学生的教育课程——从小学开始的一门必修课^[7],这种课程化的表演文本重构,使得安塞腰鼓表演从传统民俗信仰实践转变为体系化的公共文化知识。安塞腰鼓表演传承人依托特定课堂教学的表演空间,使得非遗知识在不同时空中实现文化重构,这也是文化功能变迁的再语境化过程^[20]。可见,当前安塞腰鼓表演不再囿于传统语境下的乡土仪式空间,而是再语境化与非遗进校园深深联结,实现村落与课堂的表演空间转化。安塞腰鼓表演不但作为必修教育课程存在,而且也通过校本教材的记录教学,实现了再语境化的标准化训练。安塞枣园中学每周于特定时间集中学生在操场上训练,这也是校园社群对本土地方文化的公共性习得,呈现出标准化的公共文化场域集群特征。这些表演安塞腰鼓的学生,其身份也发生了动态变迁。他们在传承地方乡土表演的基础上,成为校园社群乃至更为广阔的公共文化场域传播者,不仅在学校表演,还将其拓展至社区文化节、城市节庆等公共文化传播领域。这种身份转型使之成为本土地方文化的公共代言人,而安塞腰鼓表演成为他们建构地方认同、文化自信的公共文化空间媒介。

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同样联结着文旅融合的热潮,使其从乡土民俗转化为旅游公共空间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符号,实现了非遗传统文化功能重构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从 1987 年安塞被定位为“黄土风情”旅游点开始,安塞腰鼓表演俨然成为陕北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 IP^[7],从表演观赏到体验参与,再到衍生的产品消费,依托其建构的全产业链,被扩展为一种复合型公共文化产品。旅行团小型专场表演^[7],实则彰显的是文旅资本对安塞腰鼓表演公共文化价值的市场化挖掘。因此,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进入公共旅游场域后,已从乡土村落的祭祀仪式转变为景区公共空间的文化符号,它不再只是面向陕北的地方化表演仪式,而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游客的公共文化传播行为。游客观看和参与安塞腰鼓表演,进而感知深蕴其中的地方文化记忆,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后成为安塞社群集体与外部世界对话的公共媒介。

安塞腰鼓表演依托非遗制度的推动,从传统语境中去语境化,完成了从陕北地方性知识场域向教育、旅游公共文化场域的再语境化。在课堂表演空间中,它借助课堂教学与校本教材的改编实现了标准化传承,学生也从地方文化传承者转变为社区公共空间的文化传播者;在文旅结合的表演空间,它化身陕北文旅核心 IP,形成观赏、体验、消费的全产业链,从乡土祭祀仪式转变为面向全球游客的景区文化符号。因此,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突破了传统乡土仪式空间的局限,实现了从地方性民俗到公共性文化符号的变迁,充分彰显出非遗鼓舞在当代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重要价值。

(三)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中公共景观空间的权力表征

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中的公共景观空间成为交织多重权力的关系场域,它既是国家文化权力的具象化符号,也是地方权力与社群认同的载体,因此,在文化资本与权力话语博弈中呈现出复杂的表征形态。

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进入公共景观空间后,被系统性地塑造为国家文化权力的视觉符号,通过大型公共场域展演,实现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从北京鸟巢舞台表演到国庆庆典展示,安塞腰鼓表演已不再是单纯的民俗表演,其动作程式与视觉符号皆被纳入国家文化展演的话语体系,成为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文化符号生产。其表演文本被国家权力规训,鼓点节奏、队形变换与表演者服饰都实行标准化

的设计,以符合国家对外展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凝聚力的话语需求,呈现出鲜明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22]。国家依托非遗认证实现国家权力对地方民俗的选择性重构,将其去语境化,赋予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化意涵。安塞腰鼓表演在公共景观空间中成为国家文化凝聚力的具象化表达,公共景观空间也因此成为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

在地方公共景观空间中,安塞腰鼓表演是地方权力与社群文化认同的双重载体。在陕北地区的文化节庆中,安塞腰鼓表演成为地方政府塑造黄土文化品牌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将安塞腰鼓民俗表演与地方经济、文化旅游战略深度联结,使其成为地方权力话语的表征,其实质是地方权力对安塞腰鼓表演公共景观空间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对于陕北社群而言,公共景观空间中的安塞腰鼓表演是其文化认同的仪式性表达,当安塞村民操起腰鼓在公共景观空间进行表演时,他们既是地方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地方身份的建构者;在传递地方文化记忆的同时,又在强化着内部社群的文化认同。因此,该空间已然成为地方社群与外部听众的互动场域,安塞腰鼓表演作为进入公共景观空间的文化符号,其再语境化也成为地方权力与社群认同交织的产物。

与此同时,地方权力对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塑造并非单向的,而是有着社群传承人的地方文化抵抗,以此维护传统乡土文化的本真性。这种抵抗使得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中的公共景观空间呈现国家、地方、社群的多方权力博弈,安塞腰鼓表演则成为这种博弈下的视觉化呈现。

三、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中的空间泛化与文化意义生产

安塞腰鼓表演的去语境化过程将诸多表演元素抽离,成为在不同空间流通的文化符号,进而催生符号消费的观念,当带有乡土场域特征的表演符号演变为消费符号、媒体空间符号以及商业符号时,安塞腰鼓表演的空间文化意义与祭祀文化内涵呈现空心化。与此相对的是,空间泛化虽会带来符号化的风险,但是再语境化过程中,安塞腰鼓文化意义也实现了从安塞地域文化载体到大众文化中民族精神符号的跃迁,完成了从地方意义到国家意义、民族意义的生产。

(一)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中空间泛化的文化符号消费

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过程是将表演文本视

为客观化的文本化语境变迁,当它从传统语境下的乡土仪式空间脱离,进入舞台、商业等公共场域时,原本完整的表演文本也被抽象为可复制、可传播的文化符号,进行跨语境的流动,进而陷入空间泛化的符号消费危机。

安塞腰鼓表演在传统语境中具有“灵韵”^{[23](P8)},来源于乡土仪式空间建构的仪式性、原真性与不可复制性,其再语境化后进入公共景观空间中的审美场域与文化场域,往往形成跨语境表演符号的视觉化消费,听众关注的不再是其背后的祭祀文化内涵与乡土文化记忆,而是表演的视觉冲击、节奏张力等美学符号特征。这种“灵韵”的逐渐消逝使得安塞腰鼓表演从仪式表演成为碎片化视觉符号,其文化内涵的空心化风险也随之加剧。同时,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与文旅融合,往往会带来商业化的市场介入。当安塞腰鼓表演大量出现在旅游景区、商业庆典时,带有乡土仪式空间特征的表演服饰、鼓点、动作程式也会被异化为非遗表演的消费符号,久而久之,便与传统语境中的隐性社会纽带、祭雨祈天的深层信仰传统割裂,成为公共景观空间中的商业文化碎片。

此外,公共媒体空间中的文化符号建构也让安塞腰鼓表演陷入了同质化复制的困境。为了适应大众传媒的审美范式,安塞腰鼓表演被不断标准化、模式化,其动作的幅度、节奏的快慢与队形的编排都开始趋向统一的视觉模板,以此来满足媒体传播的效率需求,这削弱了其原生的文化多样性与仪式神圣价值,使得其在空间泛化中逐渐丧失地域文化归属,陕北民众也呈现出信仰传统的断裂与身份认同的危机。

(二)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从地域文化到大众文化的意义生产

空间泛化给安塞腰鼓表演带来了表演符号的视觉化消费危机,但安塞腰鼓表演在再语境化过程中并非完全陷入符号空心化,而是实现了文化意义从地域文化载体到大众文化中民族精神符号的变迁,完成了从地方意义到国家意义、民族意义的生产。

安塞腰鼓表演依托传统语境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形塑为带有集体力量的磅礴表演风格,当这种表演元素再语境化进入公共景观场域时,其豪迈的鼓点、整齐的队阵成为国庆庆典、民族文化展演等国家级场域的集体民族符号象征。它超越了乡土地域的文化边界,升华为展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并将地方集体记忆转化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共鸣。

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同样也推动了非遗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在大众文化的公共景观场域中,安塞腰鼓表演不再局限于传统仪式的功能,而是以创新的表演形式和多元的融合路径,适应现代听众的审美需求,使其在大众文化的土壤中获得新的生长空间。

因此,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空间泛化衍生的表演符号消费危机虽影响着乡土仪式文化的原真性,但文化意义的创造性动态语境生产又使其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焕发生机。这种张力本质上反映了民俗表演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唯有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不断适应语境的变迁,才能既守住乡土文化记忆,又创新性实现从地域文化到大众文化价值的升华。

四、结语

安塞腰鼓表演再语境化的过程,既是其从黄土高原乡土场域走向现代公共景观空间的动态变迁,也是文化意义在传统语境与现代语境张力中不断重构的阶段。安塞腰鼓表演在传统语境下依托黄土沟壑的地理地貌形塑承载集体记忆的乡土村落社群,并通过其中蕴含的祈雨祭天信仰传统建构了隐性的神圣祭祀仪式空间,从而由个人至社群,共同实现对陕北传统乡土场域的地方认同。从乡土场域到公共景观,现代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实践使得表演文本的文化意义发生重构,一方面是公共审美空间特性使其趋向公共审美范式,在听众美学规训下实现舞台审美艺术的转化;另一方面是在与公共文化场域融合中,逐渐成为社群文化的建设载体,不断在教育与旅游场域中实现文化功能的拓展,并在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中被塑造为彰显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符号。

安塞腰鼓表演的再语境化过程虽面临空间泛化带来的祭祀内涵消解、表演符号视觉化消费危机,却也突破了地域边界,实现了从地方文化载体到民族精神象征的跃迁。这一过程本质上彰显了传统民俗表演在现代语境中的动态适应与文化转译,要在坚守文化内核本真性的同时,主动实现再语境化的语境变迁与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民俗表演既承载着传统语境下乡土社会记忆与地方信仰传统,又能在再语境化后的大众文化场域中焕发活力与生机。

参考文献:

[1]李蕾,曾玉华.陕西高校非遗体育文化进校园的思考与启示——

- 以红拳与安塞腰鼓为例[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4(6).
- [2] 杜勇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安塞腰鼓的传承与发展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 [3] 赵杨. 大众文化视域下安塞腰鼓的审美特征及文化内蕴[D]. 湖南师范大学, 2018.
- [4] 徐国忠, 焦建军. 安塞腰鼓的社会特征与功能价值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6(4).
- [5] 常特. 文化生态视角下安塞腰鼓的变迁与调适[J]. 武术研究, 2021(6).
- [6] 孙双明. 安塞腰鼓传承方式及其变迁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 2017.
- [7] 高娜. 安塞腰鼓的田野考察与研究[D].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9.
- [8] 康靖华. 安塞腰鼓的风格特征及文化价值的研究[D]. 西安体育学院, 2009.
- [9]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M]. 北京: 中国 ISBN 中心, 1995.
- [10] 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塞年鉴[M]. 榆林: 榆林市诚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07.
- [11] 郭志东. 安塞腰鼓[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
-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3] 黄彩文, 于霄. 地方节日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表征——以广南壮族皇姑节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 [14]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M]. 北京: 中国 ISBN 中心, 1995.
- [15] 高长江. 民间信仰: 文化记忆的基石[J]. 世界宗教研究, 2017(4).
- [16] 张新德, 张熙智. 安塞腰鼓[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 [17] (奥)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文良文化,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 [18] Richard Bauman. A World of Others' Word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textuality[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4.
- [19] 谭萌. 从生活仪式到舞台展演: “非遗”视野下土家族撒叶儿嗬仪式的变迁[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1).
- [20] 赵书峰. 合作·重构——“非遗”乐舞表演文本的“再语境化”[J]. 中国音乐, 2025(2).
- [21] Richard Bauman.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2] 赵书峰. 文化重构与声景变迁——以瑶族“还家愿”与“盘王节”仪式音声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 2021(6).
- [23] (德)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王才勇,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 yelirong@126.com

From Rural Context to Public Landscape: Spatial Narratives of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Ansai Waist Drum Performance

Li Peng Du Ruoz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Abstract: The spatial narratives of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Ansai waist drum performance reflect the dynamic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unde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performance space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context,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Ansai County, evolved into a sacred space aggregation with the belief of praying for rain and worshipping heaven, and the spatial narrative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context was jointly constructed by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From rural context to public landscape,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practice of modern Ansai waist drum performance has l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performance text. On the one h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aesthetic space make it tend towards the public aesthetic paradigm; on the other hand, it gradually becomes a carrier of community culture in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public cultural context and is shaped into a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 with power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of Ansai waist drum performance, although the spatial generalization has led to the partial dissolution of the sacrifici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symbols, it has also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cultural meaning from a regional cultural carrier in Ansai to a national and ethnic spiritual symbol in popular culture, achieving the production from local significance to national and ethnic significance.

Keywords: traditional rural context; performance text;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 public cultural context